

冷战国际史研究系列丛书

这部书对冷战前期大国关系变化的具体剖析与阐述，有助于人们深入认识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也对
中国如何利用复杂的国际环境维护国家利益、承担大国责任、发挥大国作用，提供了借鉴。

冷战前期的大国关系

美苏争霸与亚洲大国的外交取向
(1945—1972)

COLD WAR



徐天新 沈志华 / 主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冷战国际史研究系列丛书

本书由北京大学历史系赞助出版

冷战前期的大国关系

——美苏争霸与亚洲大国的外交取向

(1945—1972)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冷战前期的大国关系：美苏争霸与亚洲大国的外交取向 (1945—1972) / 徐天新, 沈志华主编.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1. 2

ISBN 978 - 7 - 5012 - 4025 - 8

I. 冷… II. ①徐…②沈… III. ①冷战—国际关系史—研究 IV. ①D8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11177 号

书 名 冷战前期的大国关系

——美苏争霸与亚洲大国的外交取向 (1945—1972)

Lengzhan Qianqi De Daguo Guanxi

——Meisu Zhengba Yu Yazhou Daguo De Waijiao

Quxiang (1945—1972)

责任编辑 罗养毅
责任校对 陈可望
责任出版 刘 喆
封面设计 春天书装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印 刷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980 × 680 毫米 1/16 32½ 印张
字 数 54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1 年 4 月第一版 2011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012 - 4025 - 8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所谓冷战，是指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以及分别以它们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集团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意识形态、文化乃至科学技术等领域表现出来的一种既非战争又非和平的对峙与竞争状态。

美苏冷战始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冷战是由美苏之间的矛盾斗争引发的。冷战格局的产生、延续和变化，反映并体现了美苏以及世界主要大国的战略选择，不仅具有传统的大国利益冲突的现实内容，具有明显的地缘政治与战略特点，同时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的特征。冷战在第二次大战后的一段长时间内占据了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在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冷战对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影响十分巨大和深远。

冷战是人类历史中特殊的一页。它对于从第二次大战过来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来说，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冷战时期，斗争的双方严重对立，激烈竞争包括军备竞赛及核竞赛。地区性冲突连绵不断，世界处于核恐怖核威胁之中，并一度陷入核大战的危险边缘。有历史学家称冷战是“近代历史上的荒谬插曲”，是“漫长的、代价高昂的、黑暗阴郁的、危险的事件”，是“人类最接近于集体自杀的一次经历”。^①各国政治家和学者纷纷谴责冷战，批评冷战的发动者和加剧冷战对峙的大国领导人。不过也需要看到，美苏在冷战对峙的同时，不断寻求对话与缓和，寻求一种自我控制机制。美苏之间的战争和世界大战没有发生，世界和平至今也维持了半个多世纪。冷战本身的演变过程是非常复杂曲折的，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影响更是多方面的。

今天，冷战虽已结束，但一些大国政治家们仍不时以冷战思维分析处理问题，

^① 小阿瑟·施莱辛格：《冷战给我们的某些教训》，《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92年第8期，第2、5页。

大国战略互动关系依旧复杂多变，影响国际局势的发展。人类社会至今仍在承受着冷战遗留下来的众多后果。所以，冷战至今仍是人们关注和研讨的一个重要课题。

对冷战史的研究早在冷战刚出现不久就开始了，至今不衰。苏联对冷战史的研究大多限于对事件的叙述和对美帝国主义的指责，认为冷战完全是美国一手挑起的。美国的对苏冷战政策是其帝国主义本质决定的。美国不仅敌视社会主义苏联，而且妄图消灭后者以独霸全世界。它所奉行的“实力政策”和“扩张政策”引发了冷战，苏联的反应只是防御性的。苏联学者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可见德波林、库塔科夫、叶戈罗娃等人的著作。^①官方还出版了各种外交政策文件集，^②西方国家也十分重视冷战问题的研究。美国国家档案馆，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里根等总统的图书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珍本手稿部等处保藏有大批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档案。美英等国定期出版外交政策文件集。西方有关冷战的论文专著多不可数，观点见解各不相同。概括地说，40年代出现“正统学派”，代表人物有威廉·麦克尼尔、赫伯特·菲斯、贝利、西顿—沃森、诺曼·格里布纳等。^③他们从其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把产生冷战的责任全部归咎于苏联的扩张。认为冷战之所以不可避免，是由于苏联的共产主义扩张及其专制制度，斯大林把革命的狂热和领土的扩张结合在一起，使西方世界感到震惊，于是引发了美国的强烈反应，苏联寻求世界霸权是导致冷战爆发的主要原因。这种说法最初来自当时美国的一些学者和当政者。60年代，“修正学派”的观

① Деборин Г. А.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и ее фальсификаторы, Москва, 1960; Кутяков Л. Н. Истор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и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ССР, 1917 - 1972, Москва, 1975; Егорова Н. И.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послевоенного периода в буржуазной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 США, Москва, 1981.

② 如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61 - 1980, Сб. Документов, Москва, 1962 - 1981;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ССР за 50 лет, Сб. Документов, Москва, 1967; Сборник действующих договоров, соглашений и конвенций, заключенных СССР с иностранны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с 36 вып. - Сборник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договоров СССР), Вып. 1 - 38, 1920 - 1982 гг., Москва, 1924 - 1984.

③ 他们的代表作见 W. H. Meneil, *America, Britain and Russia: Their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1941 - 1946*, New York, 1953; Herbert Feis, *Churchill, Roosevelt, Stalin: The War They Waged and the Peace They Sought*, Princeton, 1957; T. A. Bailey, *America Face Russia*, New York, 1950; H. Seton-Watson, *Neither War nor Peace: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the Post-War World*, New York, 1959; Norman A. Graebner, *Cold War Diplomac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45 - 1975*, New York, 1977.

点逐步流行起来，代表人物有：威廉·威廉斯、唐娜·弗莱明、科尔科兄弟、劳埃德·加德纳、戴维·霍罗威茨、托马斯·佩特森等。^① 他们认为冷战的主要责任不在苏联而在美国。冷战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需要而发生的，资本主义的经济需要一个世界体系，而美国的决策者们担心，苏联和其周围的共产党国家会与世界经济体系相互隔绝，因此对苏联发动了冷战。苏联主要是自卫的，如果美国不疏远苏联，冷战或许可以避免。苏联的安全需要不应该受到指责。美国对苏联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是冷战爆发的重要原因，美国的强硬政策和行为方式迫使斯大林与西方敌对。这一派的代表主要是学者，其观点虽出现于 60 年代前半期，但主要阐述于 70 年代初，到 90 年代冷战结束后仍然有学者持这种观点。70 年代又兴起“后修正学派”，代表人物有：约翰·加迪斯、林恩·戴维斯、丹尼尔·叶尔金等。^② 他们认为冷战是一系列的失误和误解引起的，双方对冷战的爆发都负有责任。90 年代，美国又出现了“新后修正学派”，他们认为斯大林应该对冷战的发生负主要责任。^③ 另外，“后修正学派”有一个重要分支，有人称其为“非极化派”。他们抛弃美苏两极论观点，把研究视野投向别的国家，重视英国以及北欧国家在冷战形成中的作用。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费雷泽·哈伯特、艾伦·布洛克等。^④

90 年代初，俄国大批历史档案解密。有关冷战问题的档案资料主要保存在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АВПРФ）、俄罗斯当代史国家档案馆（РГАНИ）、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ЦХСД）、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АПРФ）、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ЦАМО РФ）等处。俄国学者在《文献资料》（Источники）、《苏共中

① 他们的代表作见 William A. Williams, *Tragedy of America Diplomacy*, New York, 1962; D. F. Fleming, *The Cold War and its Origins*, New York, 1961; J. Kolko & G. Kolko, *The Limits of Power*, New York, 1972; Lloyd C. Gardner, *Architects of Illusions: Men and Idea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41 - 1949*, Chicago, 1970; David Horowitz, *The Free World Colossus: A Critiqu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Cold War*, New York, 1965; Thomas C. Paterson, *Soviet-American Confrontation. Postwar Reconstruction o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Baltimore-London, 1973.

② 他们的代表作见 John L.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1 - 1947*, New York, 1972; Lynn E. Davis, *The Cold War Begins: Soviet-America Conflict over Eastern Europe*, Princeton, 1974; Daniel Yergin, *Shattered Peace: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Boston, 1977.

③ 关于该派的主要看法，可参见：John L.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④ 他们的代表作见 Fraser J. Harbutt, *The Iron Curtain: Churchill, Americ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1986; Alan Bullock, *Ernest Bevin: Foreign Secretary 1945 - 1951*, New York, 1983.

央通报》(Вестник ЦК КПСС)、《历史档案》(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近现代历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祖国历史》(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等杂志上公布了大量的专题性档案文献, 俄国档案部门与研究机构合作, 整理并出版了一系列文献集。此外, 很多前国家领导人(如 Н. С. 赫鲁晓夫、А. И. 米高扬、А. А. 葛罗米柯等) 和外交官员(О. А. 特罗扬诺夫斯基、А. М. 亚历山大罗夫-阿根托夫、А. Ф. 多勃雷宁、Г. М. 科尔尼延柯等) 还相继发表了极具研究价值的回忆录。在这一基础上, 俄国学者发表了大量的论文或专著。^① 他们从新的角度探讨苏联在冷战起源中的作用, 认为美国和苏联对于冷战的起源和发展都负有责任。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的冷战史研究也有迅猛发展。他们花费重金购入大量俄国档案, 并在近十几年推出了一批很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使冷战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个研究亮点和热点。^②

作为当前国际关系学和历史学界的一门显学, 冷战史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 冷战史研究日益形成规模化、组织化。各国都出现冷战史研究中心, 学者们经常会聚一堂, 交流、研讨专业问题。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国际冷战史项目不定期出版《国际冷战史项目公报》(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享誉国际学界, 美国哈佛大学戴维斯俄国研究中心编辑的《冷战

① 比较突出的著作有: Лельчук В. С., Пивовар Е. И. СССР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Московское городское объединение архивов, 1995; 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талин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Москва, 1998; Гайдук И. В., Егорова Н. И., Чубарьян А. О. Сталинское десятилетие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факты и гипотезы, Москва, 1999; Быстрова И. В.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СССР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40-х-начало 60-х годов, Москва, 2000; Валковский Н. Л. гла. ред. Война в Корее, 1950 - 1953,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00; Егорова Н. И., Чубарьян А. О.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1945 - 1963, Москва, 2003。涉及各个领域具体问题的专门论著不胜枚举。还可参见 Gabriel Gorodetsky ed., Soviet Foreign Policy 1917 - 1991, A Retrospective. London, Frank Cass, 1994。

② 其中在学术界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有: Melvyn P. Leffler, *The Specter of Communis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17 - 1953*, New York, 1994; Vladislav Zubok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 Boston, 1996; Vojtech Mastny, *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The Stalin Years*, New York, 1996;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New York, 1997; Zhai Qiang, *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s, 1950 - 1975*, Chapel Hill, 2000; Zhang Shu Guang, *Economic Cold War, America's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9 - 1963*, Stanford, 2001;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2001; Whitney Stueck, *Rethinking The Korean War: A New Diplomatic and Strategic History*, Princeton, 2002; William Taubman, *Khrushchev: the Man and His Era*, New York, 2003; Odd Arne Westad, *Decisive Encounters: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6 - 1950*, Stanford, 2003; John Lewis Gaddis, *The Cold War: A New History*, New York, 2005, 等等。

研究季刊》(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和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编辑的《冷战史》(Cold War History) 也是冷战史研究者必读的专业刊物。在这些杂志周围, 聚集了相当一批来自各国的历史学家。在俄国, A. O. 丘巴里扬、M. M. 纳林斯基等俄国科学院世界通史研究所的学者在 1995 年组成了冷战史研究组, 后来, 斯拉夫学研究所 (B. K. 沃尔科夫、Л. Я. 吉比安斯基等)、俄国史研究所 (H. E. 贝斯特罗娃、B. C. 列利丘克等)、远东研究所 (A. M. 列多夫斯基、C. Л. 齐赫文斯基等)、圣彼得堡的历史研究所 (A. A. 富尔先科)、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 (A. B. 托尔库诺夫、B. O. 佩恰特诺夫等) 的学者们也进入这个团体。到 20 世纪末, 原社会主义国家的东欧各国也相继成立了专门的冷战史研究机构。

第二, 东西方学者频繁举行国际会议, 研讨冷战中的各种问题。1993 年 1 月在莫斯科, 1994 年 6 月在埃森和波茨坦, 1996 年 1 月在香港, 1996 年 11 月在波茨坦, 1997 年 10 月在北京, 1997 年 10 月和 1998 年 4 月在莫斯科, 1999 年 9 月在纽黑文, 2000 年 3 月在华盛顿, 2002 年 6 月在莫斯科先后举行了不同专题的国际会议。原冷战两大阵营的各国学者逐渐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 他们聚在一起, 相互交流档案资料和学术观点, 共同探讨冷战的起源、过程、教训和遗产, 极大地推动了冷战史的学术研究。

第三, 随着各国历史档案不断解密和冷战史研究水平不断提高, 利用原始档案资料进行研究已经成为冷战史领域的必然要求, 甚至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很多研究者不仅仅是使用单边材料, 而是使用多边档案从事自己的研究。综合利用各国档案文献解剖一个专题, 正在成为国际冷战史研究的一个新特点。

中国学者对冷战史研究起步较晚。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 冷战史研究也逐渐成为中国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问题。其主要观点有: (1) “美国霸权论”, 认为造成冷战紧张局势的根源是美国推行的霸权主义, 美国必须对冷战承担主要责任。(2) “美苏共振论”, 认为冷战是美苏双方行为的结果, 是一个双向的过程。(3) “综合作用论”, 认为以美苏争夺为核心的东西方冷战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①

当前, 中国正在和平崛起, 在国际事务中, 在防止大国再度陷入相互敌对和

^① 比较有代表性的著述有: 时殷弘:《美苏从合作到冷战》,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8 年; 张小明:《冷战及其遗产》,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张盛发:《斯大林与冷战》,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

威胁局面，维护和平、安定和有利于发展国际环境的斗争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总结冷战的丰富经验教训特别是美苏之间大国关系的变迁，为中国更好地发挥大国作用提供借鉴，已成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之一，更是历史学家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这一形势下，中国史学界加快对这一问题的研究。90年代中期，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最先倡导以冷战史为课题组织国内学者进行研究和交流，并与国外研究机构建立起学术联系。随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现代史料研究中心和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分别成为中国冷战史研究领域自然形成的两个研究基地。他们注意查阅我国的中央和地方档案资料，赴美、俄、英等国搜集资料，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与各国学者对话交流；他们在研究中特别关注中国在冷战中的实际作用和政策变动，力图纠正一些文章书籍中的不准确甚至错误的阐述。由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牵头，他们先后在北京（1997、1998年）、桂林（1999年）、成都（2000年）、武夷山（2002年）举办专门学术会议，与国内外学者互通信息、交流成果、研讨问题。2004年，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冷战史专业杂志《冷战国际史研究》和第一个专业网站（www.coldwarchina.net），并开始招收冷战史专业的博士生。在此期间，中国学者的冷战史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为国际冷战史领域增添了令人瞩目的色彩。^①

本书是活跃在冷战史研究领域的几位中国学者集体创作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年来中国历史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水平。

冷战的历史十分丰富。本书没有全面探讨这一问题，而是着重剖析大国关系，即美苏之间的关系，揭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对峙和争夺是如何决定着冷战的内容及其走向的。其他大国同美苏不在一个等级上，不能与之并列。

① 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李春放：《伊朗危机与冷战的起源（1941—1947年）》，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李丹慧主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章百家、牛军主编：《冷战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李丹慧主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沈志华：《斯大林与铁托 苏南冲突的起因及其结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年代：1954—1958年的中美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刘金质：《冷战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沈志华：《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牛大勇、沈志华主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徐天新：《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

冷战格局的出现，从根本上讲并非人们的主观预想和设计，而是美苏及各主要大国根据彼此的经济实力、军事力量和意识形态所做出的战略选择，并表现为一种互相影响、同步前进的趋势。冷战所触及的问题，比一场真正的战争更深刻，更复杂。因此，本书论及冷战起源问题时，没有简单地去寻找和追究这场政治斗争的责任者，没有把重点放在评论各国的责任大小问题上。而是着重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国际形势，揭示它为冷战的爆发提供了哪些条件；进而剖析美苏两国在国家大战略、以及政治、军事、经济、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巨大差异和激烈碰撞，展示美苏关系是如何从战时合作走到冷战对峙的。

冷战格局与20世纪上半叶的国际局势大不相同。它包含有“冷”和“战”的不同层面，即大国不仅在各个领域相互敌视对抗，争夺霸权，而且注意防止热战特别是热核战争，加深彼此间的沟通、了解和信任，寻求共同利益和维护这一利益的游戏规则。基于这一认识，本书着重探讨永不会消失的大国间矛盾斗争是如何从不断扩大加强转为被限定在某一范围内的，而不断受到限制的大国间矛盾斗争又是如何发展变化的，从中展示美苏关系的复杂多变，冷战历史发展的艰难曲折。

评述美苏冷战关系的演变时，必然涉及美苏同其他大国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亚洲大国的作用不容忽视。它们的外交取向对美苏关系、对冷战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有时甚至是关键性影响。

亚洲是欧洲及核竞赛之外另一个美苏争斗的重要领域，它与欧洲地区有着明显的不同。在欧洲呈现出两大阵营、两大军事集团对抗的典型的两极格局，且具有成熟的政治、安全、防务协商机制。亚太地区则呈现为多元结构、多种军事力量并存的状态，在相当一个时期，难以形成欧洲式的对话机制。在亚太地区，双边关系，包括双边对话机制、防务联合等，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故此，亚太地区往往受到本地区主要国家双边关系变化的影响，形势多变。这里有激烈的武装冲突：美国直接参与、苏联暗中和间接参与的两场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有影响两大阵营力量对比的巨大事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苏分裂及中美和解。这些情况，再加上苏、美、中、日、印大国之间关系的不断变化和互动，不仅影响到亚太地区的冷战格局，而且影响到整个世界冷战的态势及其演变。

国外学者对冷战历史的评论和著述虽然很多，但带有明显的美英或俄国色彩，对中国等亚洲大国在冷战中的地位作用评述不多。即使讲到，谈论的也多是美苏冷战如何影响着亚洲地区的局势，较少论及亚洲大国的外交政治取向如何反过来影响美苏之间的冷战对峙关系，有些评述还带有攻击贬低之词。这不能不说是冷战史研究的一个不足和问题。

为了弥补这一缺憾和深化冷战史研究，本书特别关注中国、日本、印度与美苏之间的战略互动关系，关注亚洲大国的外交取向对美苏关系和国际冷战格局的影响，系统提出中国人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观点。

冷战延续了将近半个世纪。从全球角度观察，整个冷战历史大体可以 70 年代初社会主义阵营最终分裂和中美关系走向缓和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如果说冷战前期是纯粹的美苏争霸和两个阵营的对抗，那么在冷战后期，由于中国在某种程度上退出两大阵营之间的抗争，并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国际政治格局则出现了重大结构性变化，从而导致冷战态势的根本改变。本书采用这一分期，意在突出中国等亚洲国家在冷战演变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所探讨的大国关系则限于冷战的前期。

本书各章虽然出于不同作者之手，但大家都尊崇一个原则，即实事求是地对冷战历史的进程进行客观描述；都运用一种方法，即辩证唯物史观和实证史学、比较史学的基本方法，对各国档案文件等原始资料进行观察和梳理。目前美国的冷战史研究有一种趋向，一些学者似乎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以一种冷战胜利者的心态和架势回顾并评判过去的历史，把一切“责任”和“罪过”都推到失败者头上。^① 本书作者认为这种研究态度和方法是错误的。历史研究作为一门科学，应尊重客观，尊重史实。

本书是集体作品，各位作者在不同的研究侧面又都各具独到见解，独特风格，因此在某些问题上出现观点和提法不尽相同的情况，在所难免。这次合作本身，也是一个互相切磋、共同提高的过程。另一方面，本课题涉及的领域比较广阔，研究的问题比较复杂，而我们的水平有限，书中肯定有不少疏漏不当之处，敬请同行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① 美国冷战史大家约翰·盖迪斯的名著《现在我们知道了：对冷战史的重新思考》（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这种状况。

目 录

序 言	3
第 一 章 美苏大战略与冷战格局的演变 (1945—1972)	1
第 二 章 美苏从同盟到全面冷战的转变	52
第 三 章 赫鲁晓夫的对美政策和两国关系的新变化	84
第 四 章 中苏同盟的兴起与衰亡	118
第 五 章 1956 年波匈事件中的苏中关系	163
第 六 章 中美苏在印度支那的角逐及相互关系的 变化 (1961—1973)	210
第 七 章 中苏同盟的破裂及其原因	270
第 八 章 台湾问题与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的美中关系	285
第 九 章 战后初期美日关系的再选择与再定位	354
第 十 章 美日与苏中在东亚冷战对峙格局的形成	415
第 十 一 章 冷战初期的印度外交政策与印美苏中 之间的互动关系	439
结 束 语	498

第一章 美苏大战略与冷战格局的 演变（1945—1972）

所谓冷战，是指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以及分别以它们为首的两大集团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意识形态、文化乃至科学技术等一切方面的既非战争又非和平的对峙与竞争状态。冷战不仅具有传统的大国利益冲突的实在内容，具有明显的地缘政治与战略特点，更以其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为主要特征；另外，冷战双方在进行激烈的军备竞赛特别是核竞赛的同时，又具有使美苏两国之间始终避免兵戎相见的自我控制机制。^①

今天，当我们从历史的长镜头中去考察冷战起源这一国内外学术界的持续不衰的研究课题时，至少要考察冷战爆发的国际背景，以及美苏在国家大战略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所谓“大战略”，是指一个国家无论在战时还是处于平时时期，它的最高层面上的战略，即指该国的最高领导层力图集中他们的全部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利用军事的和非军事的手段，诸如利用其经济、人力与物力、技术与文化的资源，以及外交与道义方面的压力，去保卫和加强他们所认定的本国最为长远的最高国家利益。^②

概括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国际形势，为冷战的爆发提供了条件；而美苏两国的国家大战略之间的激烈碰撞，以及它们依据各自国家的大战略而制定的对外政策，则最终使冷战未能避免。

^① 关于冷战中的双方自我控制机制的分析，参见 John Lewis Gaddis, *The Long Peace: Inquir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215 - 245. 这种自我控制机制，在第二次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中运用得最为突出。

^② 关于“大战略”的论述，可参见 Paul Kennedy ed, *Grand Strategies in War and Pea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2 - 7; Henry Liddell Hart, *Strategy*, New York, 1974, p. 322. 另外，这里所说的大战略，也是对各国政府在具体贯彻这一大战略中所制定的军事、外交等各种战略和策略的一种区分。

一、雅尔塔体系与冷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一跃而成为雄踞资本主义世界之首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大国。在经济上，它是唯一因战争而大发其财的国家。当战争结束时，它的黄金储备已达200亿美元，几乎占世界总量330亿美元的2/3；美国生产的各种产品占世界总量的1/3；它的船舶总吨位占世界的一半。在军事上，在欧战结束时，美国的武装部队人数高达1200多万，国防预算超过800亿美元。它的陆军仅次于苏联，海军已在全球居于远超英国皇家海军的至高地位，制空权更为优越，可以向世界各地快速输送兵员。到1946年，美国军队已经在遍布世界的56个国家驻扎，到1947年，它已在海外建立了484个军事基地。它还在战后初期垄断着原子武器。^①在政治上，美国已把整个西欧置于它的保护与控制之下，一度不可一世的日本也成了它的手下败将。美国所具有的这种巨大优势，不仅使它有了一种“飘飘然的自我优势感”，而且认为“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时代”已经到来了。^②

另一方面，在战争中以经受严峻考验而令盟国刮目相看的苏联，虽然在经济上逊于美国，但军事、政治亦十分强大，它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整个军事实力仅次于美国；它收复了战争中的失地，还兼并了一些其他国家的领土，从而改善了西部的战略环境；它进一步使整个东欧处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与西方相对而立；再加上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的重大贡献和显示出的巨大能量，使它在全世界赢得了很高的威望。于是国际关系的大格局就从传统的以欧洲为中心并支配世界的时代逐渐过渡到美苏对峙的时代。这个新的两极格局的基石，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期由“三巨头”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通过一系列重大的国际会议达成的一系列协议所确立的雅尔塔体系。

雅尔塔体系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 打败德、日法西斯，并在两国彻底铲除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以防止法西斯主义东山再起。主要包括：（1）具体制定打败德、日法西斯的战略战术；（2）在

^① 参见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中译本），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年，第439页；《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7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页；戴维·霍罗威茨：《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中译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63—64页；乔治·马立昂：《美帝国主义的扩张》（中译本），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3年，第16—17页。

^② 参见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439—440页。

打败德、日法西斯以后，盟国对德国（包括对柏林）的分区占领和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消灭法西斯主义的影响，以及对德国赔偿的原则规定和对战犯的审判决定。

2. 重新绘制战后欧亚地区的政治版图，特别是重新划定德国、日本、意大利等法西斯国家的疆界及其被占领地区的归属与边界。主要包括：（1）在欧洲：盟国（美、英、苏、法四国）分区占领德国和柏林；关于波兰的疆界和临时政府组成的协议；英、苏关于东南欧的百分比协议。^①（2）在亚洲：通过关于苏联对日作战条件的秘密协定，满足了苏联对外蒙古、库页岛南部、千岛群岛和旅顺大连的要求；苏联则承诺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中苏友好同盟协定”，并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和整个亚太战略，让美国控制中国和单独占领日本；朝鲜实行国际托管，以后独立（战后美苏分区占领朝鲜，以北纬 38° 线为界）。

3. 建立联合国组织，作为协调国际争端、维持战后世界和平的机构。联合国的核心机构安理会的表决程序实行“雅尔塔公式”，即“大国一致原则”，以美苏中英法五大国为核心，以联合国为主导，保护中小国家的安全，维持世界和平。

4. 对德、日、意的殖民地以及国联的委任统治地实现托管计划，在世界范围内提倡和平、民主、独立的原则，承认被压迫民族的独立权利。

雅尔塔体系是对大战结束后世界的和平安排，但是它具体运作的结果，它带给我们这个世界的最直接最有影响的后果，却是美、苏对峙下的冷战。它持续了 40 多年，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近半个世纪中的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二战结束前，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1933—1945 年在任）确信美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他对战后世界的考虑是以美国为首的“四警察”思想，即希望把美英苏中的战时同盟关系发展为战后由美国领导的大国合作关系，以维持世界和平。这在 1942 年 1 月 1 日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时就表现得很明显，第一步是先由美、英、苏、中四国签署，第二天再交由其他 22 个国家签字。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罗斯福并不主张划分势力范围，特别是反对在战争结束之前就“为确定

^① 这是丘吉尔和斯大林在 1944 年 10 月于莫斯科会谈时的决定。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六卷上部第二分册第 336—339 页有关于这次谈判的生动记述。当时它们在半张纸上写明：在罗马尼亚俄国势力占 90%，在希腊英国（与美国一致）势力占 90%，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双方各占 50%，在保加利亚俄国势力占 75%。

世界上的每条边界和解决每个地区的政治争端花费时间”，因为这将会放松对共同敌人的作战。^①然而在雅尔塔会议前和会议期间，正是苏联的军事地位和政治威望处于反法西斯战争以来的顶峰期，战争打出了一个唯一能与美国抗衡的苏联，而社会主义越出一国连成一片的前景也已十分明显。因此罗斯福在设计战后的世界蓝图时就决不能无视这一他并不愿意看到的严酷事实。由于他把战后的美苏合作看成是落实战后世界安排的关键，于是他愿意作出一些让步，当然主要是以其他国家的利益做交易，以换取苏联的合作。苏联要求的最关键部分就是要在它的周边地区，特别是在东欧建立它的“安全带”，也就是要明确地划分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最后达成的妥协就是战争即将结束时美苏的实际军事控制线：在西方，它从卢卑克到的里亚斯特；在南方，到外蒙古（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与中国东北地区；在东方，从南库页岛、千岛群岛到朝鲜的38°线，直到中国的旅大港。这样，双方也就在实际上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尽管罗斯福在1945年3月1日向国会报告雅尔塔会议的讲话中仍然反对划分势力范围，但是他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的存在，并认为在当时“这一类的发展实际上是几乎难以避免的”。^②这种形势恰恰就是以后美苏形成的两极格局的地缘政治基础。

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在欢庆胜利之时，看到的是这样一幅历史画面：

作为战争的主要战场，欧洲、亚洲和北非地区惨遭破坏，政局动荡不安，经济恢复工作举步维艰；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过去在地理位置上并无直接关系的、但社会制度完全不同的超级大国，由于它们各自所控制的势力范围而实际形成了在中东欧、巴尔干、中近东和远东直接面对面的军事对峙；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世界和平的到来，使昔日大同盟建立的基础不复存在，同盟内部原有的矛盾也日益突显出来。这一切，为美苏之间的冲突与对抗提供了条件，并成为冷战产生的国际温床，而美国的全球扩张的大战略与苏联的保障国家安全的大战略便针锋相对，迎头相撞。

^① Samuel I. Rosenman ed., *The Public Papers and Addresses of Franklin D. Roosevelt*, Vols. 13, New York, 1938 - 1950, Vol. 12, p. 333.

^② 关在汉编译：《罗斯福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514—515页。

二、战后美苏国家大战略的碰撞

战后美国军事、经济实力的空前强大，使它认为自己有能力领导世界，并以“世界领袖”自居。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罗斯福就表明了这种思想，1944年10月21日他在美国外交政策协会发表的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讲演中说：“吾国因拥有道义、政治、经济及军事各方面之力量，故自然负有领导国际社会之责任，且随之亦有领导国际社会之机会。吾国为本身之最大利益以及为和平与人道计，对于此种责任，不能畏缩，不应畏缩，且在事实上亦未畏缩。”^①接替罗斯福成为美国总统的哈里·杜鲁门（1945—1953年在任）则声称美国是“经济世界的巨人”，“全世界应该采取美国制度”，“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未来的（国际）经济格局将取决于我们”。^②这种领导世界的强烈欲望，成为美国战后对外扩张的思想基础。

与美国综合国力的巨大增长相联系，美国不仅认为能够根据美国制定的规则建立起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中始终未能建立起来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而且在战后欧洲经济普遍拮据，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空前动荡的情况下，美国更将追求海外市场视为保持国内的繁荣与稳定，避免危机甚至战争爆发的重要手段。曾任战时美国国务卿的科德尔·赫尔写道：“无障碍的贸易意味着和平，而高关税、贸易壁垒和不公平的商业战争则意味着战争”，“如果我们能够获得更加自由的贸易，即较少歧视、较少障碍的贸易，从而使一国不会极端嫉妒另一国，使所有国家的经济水平都能够得到提高，并因此而消除在经济上滋生战争的不满，我们就能够拥有合理的实现持久和平的机会了。”^③于是，美国力图以自己的经济力量，打开全球门户，使世界经济自由化，并在美国的主导下建立了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由中、法、苏、英、美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大国一致”原则，即五个常任理事国具有否决权，确保了大国的利益并突出了大国的责任，使和平解决争端和制裁侵略都具有更大的可操作性和强制力量。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包括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均实行“双挂钩一固定”

① 法学教材编辑部审定：《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1945—1980），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67—68页。

② 托马斯·帕特森等：《美国外交政策》（中译本）下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601页；Joseph M. Jones, *The Fifteen Weeks*, New York, 1955 p. 166.

③ Cordell Hull, *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 Vol. 1, New York, 1948, p. 81.